

# 瑞典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困境<sup>\*</sup>

## ——果与因

(瑞典) 别雍·古斯塔夫森 著 廖 旻 译

**内容提要** 本文按移民来源国阐述了瑞典移民的人口状况,之后概述了出生于国外的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的就业情况。一代和二代移民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的人要低。在中低收入国家出生的人的就业率格外低——这些人通常从外在特征、名字和语言能力等方面很容易与本地人区分开来。看起来是若干具有内在关联的因素造成了这一局面。本文探讨的原因集中于移民特征、申请工作者被录用的过程、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相对高的最低工资,以及立法及其贯彻实施等方面。外来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艰难带来了各种后果。其中包括其享有社会救济和伤残养老金的人员比例比本土瑞典人要高,以及公共部门预算的压力持续增长。另外,本地人与很多移民群体之间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存在差距。移民就业的劣势也导致大量移民及其子女居住在弱势社区,居住地被隔离产生的困扰与问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影响。

### 一、导 言

本文讨论的是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处境,就整体而言他们未能拥有和本土出生的人相同的就业机会。对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从外表、姓名和语言能力上很容易将他们与当地入区分开来。就业上的弱势并不限于第一代移民,也出现在瑞典出生的移民子女身上。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研究的内容之一是瑞典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所产生的若干后果,此外还包括了他们相对于当地瑞典人获得社会救济、伤残养老金的人员比例更多和公共部门相关预算压力持续增长的原因分析。据报道,尽管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瑞典移民与当地瑞典人都处于高收入阶层,但本地瑞典人与外来移民群体在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上的确存在差距。瑞典移民因就业劣势还导致其子女居住在条件差的社区,这些居住地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及被隔离的状况会给瑞典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审视文献,探讨可以解释瑞典移民就业困境的各种理由。一些研究关注移民的居住的时长、受教育程度、语言技能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特征。还有些解释可能涉及如何接触到找工作的网络。其他种种解释关心的是对国外出生的劳动力的需求状况。调查研究表明,雇主在筛选求职申请时会留意应聘者的名字。研究还发现,换一个听起来是当地人的名字对移民来说是有利的。还有一种解释与如下事实有关: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因此雇用移民的做法没有吸引力。另外,不够成功的政策或政策不能贯彻实施也导致了大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其

<sup>\*</sup> 别雍·古斯塔夫森(Björn Gustafsson),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瑞典哥德堡大学社会工作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波恩劳动力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本文是作者的原创之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丁赛研究员为本刊约稿并校译,特此致谢。——编者注

他政策,一般的或者是专门针对移民的,可能有助于改善一些移民的就业形势。

本文在其后部分的结构是:展示背景材料,按来源国给出移民的人数;报告瑞典移民的就业形势;讨论其后果;讨论产生其后果可能的原因并最后予以总结。由于关于瑞典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不打算列出所有相关论述,只选择部分列示于文末。

## 二、瑞典移民人口及其来源国分布

瑞典成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出生于国外的瑞典移民数量极少。但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为躲避战乱而到瑞典的移民数量不断扩大。1950年,外国出生的瑞典移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一比例在1980年达到了7.5%。2011年末,瑞典拥有了142.7万外国出生的移民,占948.3万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5.1%。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外国出生移民(第一代移民)人口数量与德国相当,稍高于美国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sup>①</sup>

然而,公众口中的“移民”(immigrant)一词并不单单指在国外出生的人。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2010年报告称,2008年每四个瑞典人中就有一个具有国外背景。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在国外出生的人,还包括在瑞典出生、但双亲在国外出生(占总人口的4%)或父母中有一方在国外出生(占总人口的7%)的情形。大量国外出生的人及其子女取得瑞典公民身份。到2011年底,瑞典总人口中有65.5万外国公民,占6.7%。

表1 瑞典第一代移民与双亲来自同一国家的第二代移民数量

出生国	本人	双亲	出生国	本人	双亲
芬兰	166723	63 701	索马里	40 165	12 398
伊拉克	125 469	35 213	泰国	33 613	747
波兰	72 865	10 779	智利	28 385	7 915
南斯拉夫	70 050	29 189	中国	25 652	2 069
伊朗	63 828	14 497	黎巴嫩	24 394	14 867
波黑	56 290	13 125	叙利亚	22 357	9 058
德国	48 442	5 713	英国	21 883	685
丹麦	44 951	6 836	罗马尼亚	21 016	2 529
土耳其	43 909	25 443	印度	18 622	2 197
挪威	43 058	3 565	美国	17 755	132

表中列示20个主要来源国,截止至2012年1月1日。数据来源:瑞典统计局。

利用2012年1月的相关信息,表1列举了瑞典移民的20个最大输出国的名称与在相应国家出生、迁来瑞典的人口数量。国家按照输出人口的数量排序。表中还包括出生在瑞典、但父母双方都在那些国家出生的人口数量。这两列数字的排序有所不同,自身出生于某国度者与双亲来自该国度者的多寡并无直接关系。从表中还可看到这些国家与瑞典或远或近,地理距离变化很大。

表1还证实了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芬兰作为瑞典移民最大的输出国,大多数来自芬兰的移民已在瑞典居住了很长时间。而且,表中还

<sup>①</sup> 杜斯特曼和弗拉蒂尼《移民——欧洲的经验》,《讨论稿》第6261号,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系移民研究与分析中心,2011年(Dustmann, C and Frattini, T. (2011) “Immigr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1,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未标明父母一方出生于芬兰、另一方出生在瑞典的 17.9 万第二代移民。这意味着多达 35 万瑞典居民本人或其先辈来自芬兰。另两个北欧大国——丹麦和挪威——在瑞典的外国出生居民的来源国中排名第八和第九。这些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或者家庭原因而来。他们经常找个在瑞典出生的配偶,因此他们的子女在表 1 中体现不出来。

另一组输出大国是欧盟(European Union)的老成员国,瑞典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其中一员,目前在欧盟成员国间人口流动鲜有限制。这一组输出国包括德国(排名第七)和英国(排名第十七)。这些移民因劳动力市场或家庭原因而迁来。来自美国(排名第二十)的移民亦是如此。与来自北欧国家的移民类似,这些西方移民经常与瑞典出生的本地人结婚,所以他们的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并没有在表 1 中列出。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移民数量也很大。20 世纪 70 年代,大量务工的移民来自南斯拉夫(排名第三)以及在瑞典之后才加入欧盟的波兰(排名第四)和罗马尼亚(排名第十八)。

近来,伊拉克已成为瑞典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2000 年至今,其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超出了一倍。大部分伊拉克移民是以难民身份进入瑞典的,其原因是出于瑞典政府的人道主义;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投奔其在瑞典生活的亲属。20 世纪 80 年代来自伊朗的移民和 20 世纪 90 年代来自波黑的移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表 1 中,伊朗和波黑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情况相同的还有索马里、智利、黎巴嫩和叙利亚,只是这些国家的移民数量不多。表 1 还显示,土耳其排名第九,泰国第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则分别排名第十四和第十九。

要注意的是,瑞典最近的移民当中很可观的一部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并非以劳动力移民身份进入。从国家人口规模角度考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罕有其他富裕国家像瑞典这样接纳了如此众多寻求庇护的人及其亲属。近来的移民中有相当比例为穆斯林,单凭长相以及名字就可以把很多人与主体人群区分开来。移民人口要比本土人年轻。在都市地区和大城市,国外出生者的比例要高于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 三、瑞典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简单的图景

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处境如何?众所周知,出生在国外、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到来的很多移民找工作相对容易。外国出生与本国出生的男性在就业率方面大致相当。在这个时期本土出生的女性当家庭主妇的并不少见,因此事实上移民女性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的女性还要高。但这已成历史。瑞典本土出生的妇女的就业率已经提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几乎和男性持平。而且,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发生的就业危机当中,外国出生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滑,程度比本地人更甚。其后果是出生于外国与本国的人在就业率方面的差距扩大了。自那以后,国外出生者在就业方面的劣势就成为瑞典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巨大挑战,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下页表 2 显示了 2008 年的情形,当时出生在国外与国内者在就业方面的差距为女性高达 26%、男性高达 24%。

尽管国外出生者低就业带来的挑战在很多(但并非全部)西方国家都有发生,但瑞典出生于本国与外国的人群在就业率方面的差距堪称悬殊,无疑是其中差距最大的。<sup>①</sup>因此,对很多在国外出生的人来说,要在瑞典找到第一份工作并保住这份工作是件难事。表 2 的低就业率就展示了这一点,同时国外出生者的失业率也比本土出生者更高。还有一个情况是,国外出生者在瑞典的就业和

<sup>①</sup> 杜斯特曼和弗拉蒂尼《移民——欧洲的经验》。

失业受商业周期的影响要比本地人大。这可以理解,因为新来的外国出生人口和毕业生一起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些寻找自己第一份工作的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另外,当雇主主要解雇工人时,经常是那些刚聘用的员工——新移民和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市场。

表 2 20—64 岁瑞典居民按性别与移民状况计算的就业率(%)

出生国		女性	男性
20 — 64 岁年龄段			
瑞典	双亲生于瑞典	83	86
	父母一方生于瑞典(另一方出生于国外)	82	83
	双亲生于国外	79	80
外国		57	62
20 — 34 岁年龄段			
瑞典	双亲生于瑞典	85	87
	父母一方生于瑞典(另一方出生于国外)	79	80
	双亲生于国外	74	75
外国		49	58

数据来源:瑞典统计局。

我们必须认识到,外国出生者在就业可能性方面有很大差别。总的来说,移民的年份越长,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面的很多原因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再者,来源国与就业可能性也有很大关系。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的就业率通常总是比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更高。从外貌、姓名、经常还有语言能力方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们与主体人口区分开来。这意味着来自富裕国家、在瑞典居住了几十年的人就业的可能性与年龄相当的本地人相仿。这也意味着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刚来瑞典的人的就业可能性就相当低了。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新来瑞典的移民何以受聘的可能性偏低,对此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他们忙于参加公共部门组织并资助的各种各样的方案,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融入当地。例如,有学习瑞典语的方案。在瑞典,大部分职位都必须拥有用瑞典语交流的能力,但出生和生活在瑞典之外的人极少能够用瑞典语交谈或书写。不过,即便在瑞典居住数年之后,中低收入国家出生者受雇的机会还是相对偏低。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更是如此。

双亲都出生在外国、自己出生在瑞典的人,他们的就业形势如何呢?表 2 表明,如果我们比较不同年龄的人,他们与主体人群无甚差别。然而,如果我们集中关注作为新移民子女的年轻人,就有差别了。2008 年,自己出生在瑞典、双亲是本地人与双亲出生在外国青年男女在就业方面的差距分别是 12% 和 11%。因此瑞典移民的就业问题不仅限于第一代,也出现在他们的成年子女身上。

#### 四、移民未能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后果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在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时的劣势造成了很多后果,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其中最严重者。首先,由于没有得到高薪聘用,移民比本地人更频繁地转向一些公共部门提供的收入方案(income program)。这里有两个方案关系最紧密:社会救助(相当于中国的“低保”)和伤残抚恤金(disability pension)。要知道大多数瑞典福利计划的核心特征是人们要有工作才有资格领取,而且受益水平与工作者过去的收入挂钩,这很重要。结果就是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能指望获得与当地入相等水平的疾病津贴(sickness benefits)。同样,新移民因失业而遭受的收入损失也不会和中年本地人一样,由失业救济予以缓冲。

大量新来的移民无工作,因此也没有资格申领失业救济。另外,他们也没有资产或金融资本,因此很多人申请并领取社会救济,这是公共部门最后的收入保障网络。2011 年度的统计信息表明,本土出生的成年人中只有 2% 当年至少一次领过社会救济,而在外国出生者中相应的比例为 11%——是前者 5 倍之多。在瑞典,领取社会救济的比例在年轻人里相对较高,年长者里则低,后者几乎都能领取养老金。可以注意到,身为国外出生的年轻人就意味着领取社会救济的可能性较高:出生在国外、年龄在 18—19 岁间的人当中这个比例是 34%,而本土出生的同龄人中这个比例不超过 5%。外国出生者当中领取救济的人比例高,这一现象表明,尽管他们在瑞典人口中不超过 15%,却是领取救济的主体人群。

国外出生者在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人群中所占比例也偏大——由于身体的原因,这些处于适合工作年龄段的人被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评定为不能胜任工作。在新移民中领取伤残抚恤金的比例非常低,但随着移民时间的增长,比例在逐渐提高。在来自希腊、前南斯拉夫、土耳其和芬兰的移民中这个比例看起来特别高,很多工作移民都来自这些国家。对此还没有很好的解释,但可以指出,一些移民群体的就业问题不限于迁入新国度后的最初几年。

表 3 瑞典出生于国内与主要输出国者 2010 年家庭收入对照表

	平均收入 瑞典克朗/人口当量	在全国最好的 5% 中 所占的百分比	收入较中值低 40% 者在 同类居民中所占百分比
英国	246 742	7.9	15
本土出生	245 680	5.4	3
芬兰	221 517	3.8	5
德国	213 448	5.3	15
匈牙利	209 189	4.4	12
罗马尼亚	207 969	5.7	19
挪威	204 127	4.8	16
印度	188 436	3.0	17
丹麦	184 694	5.0	26
智利	182 802	1.2	9
波兰	180 757	3.2	19
南斯拉夫	178 181	0.8	9
俄罗斯	169 897	2.4	18
伊朗	166 295	1.8	19
中国	162 860	3.6	33
泰国	153 154	1.0	23
土耳其	147 698	0.8	19
黎巴嫩	140 968	0.6	21
叙利亚	127 868	0.4	26
伊拉克	124 495	0.3	21
索马里	107 785	0	30

数据来源:奥斯特贝格(T. Österberg)根据瑞典统计局提供的有关瑞典所有居民的文件计算。其中未获取生在波黑或美国者的数据。

大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二个后果是,它对瑞典公共部门的预算有负面影响。大多数移民是在完成教育之后来到东道国的。在移入的时,大多数人能够多年从事市场上的工作。在参与了正式的经济活动后,移民要纳税、缴纳社会保险,作为消费者他们还要为商品和服

务支付税款。作为工薪阶层,新移民不需要大量的社会保险收益,而且正当工作年龄段时他们能利用的社会和医疗服务是有限的。因此,新移民有很大的潜能通过公共预算让当地人口更富裕。不过,如果移民找不到工作,情况就可能逆转直下,如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的那样。结果,本地人有理由持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局面。

不过,如果移民人口把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当地出生的人相比,他们对现状不大满意倒也情有可原。虽然有些政府转移(government transfers)缩小了工作收入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仍存在差别。表3(上页)在第二列当中反映了2010年国内出生的人与来自移民的主要来源国的每人口当量平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信息。表中用的是整个瑞典人口的在册信息,而非抽样信息。可支配收入可以通过薪水、自主创业的收入、政府转移(退休金、失业补贴、疾病津贴、社会救济等)的总和减去所得税计算出来。第三列反映的是属于这个国家最富有的5%这类人的数量。第四列反映的是居住在瑞典的人口中可支配收入比中等收入阶层低40%的那类人的比例。这是深度贫困的一个标志,本土出生的人当中只有3%属于这种低收入家庭。

基于表3可以观察到如下现象。首先,我们看到在提到的19个来源国中,平均收入和本土出生者类似的只有一例,即英国。其他所有例子的平均收入都要低,有时低很多。最极端的是出生在索马里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只有本土出生者的43%。表的末尾我们还看到出生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来自这四个国家的移民的特点是作为避难者或者是避难者的亲属准入。很多人刚刚来,或者来了不久,大多数是穆斯林,名字和外貌都与人口的主体不同。

出生在本地还是外国的差异在最后一列表现得最为显著,它表示的是人们处于深度贫困的发生率,而国外各地出生的人的比例都更高——有时比例高达本土出生者的10—11倍。形成对照的是,就最富有阶层而言,出生在本地者与外国者的差距并不大,因为有些国家来的人表现得与本土出生者相似。出生在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挪威和丹麦的人就是如此。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不能成功找到全职工作的移民的高比例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低购买力,并导致他们中很多人及其抚养的子女居住在大城市中条件差的社区。这种空间上的集中性经常被视为潜藏着危机:人力资源低发展水平;得不到主体人群所获得的优待。居住区的隔离,特别是在族群层面上,可能造成社会紧张不安的氛围。因此不出意外地,近些年来瑞典已在贫苦的社区引进旨在改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

## 五、如何理解大量移民未能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

为何大量移民在瑞典劳动力市场上处境不佳?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可关注的视角是移民的多样性。来自很多国家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迁入的时长是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待遇如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新移民而言,总是需要时间来被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所消化,这有若干理由,例如,需要积累对东道国特定方面的了解、伴随时间的增长来获得工作的机会。同样常见的是,在东道国中对其语言的掌握也伴随时间的流逝而提高。

用移民特征来做解释包括一些明显的因素: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一些流入瑞典的移民的特征是受教育水平低,不过并非全部。再者,某人在一国受到的教育不一定能够轻易地转换到另一国。数量可观的难民和其他移民身体状况不好,这使他们不那么称职。还有一些因素与移民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有关。大量工作机会是通过信息渠道获取的,显然移民们不像本地人那样消息灵通。

从移民特征着眼可建议一些改善员工处境的措施,要提高他/她胜任工作的能力。瑞典公共部

门引进并资助了很多这样的计划,公共部门在一定范围内也组织这样的计划——例如,通过瑞典语课堂课程提高语言技能的计划,关于瑞典社会如何运转的课程等。还有的课程是要给那些只受过简单教育的移民进行普及教育。

调查研究成果表明,关注移民特质和接触网络的程度能够解释移民群体在处境待遇方面为何有这么大的不同。还有,这些缘由不能将完整的内情和盘托出,我们必须再去寻找其他方面。由此调查研究把聚光灯转向录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雇主方。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负责雇用员工的人更倾向于雇用同族群的人。在招聘部门的所有职员当中,本地人占到了压倒性的多数。到目前为止,大量调查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雇主会根据名字区别对待应聘者。那些简历上写着异域名字的应聘者即便有竞争力,但与本地名字的应聘者相比,他们被叫进去面试的机会要小很多。有异域名字的人改成本地名字后,收入就会大大改善,这一点可以从调查材料中得到支持。

为什么在招聘过程中决定人选时,一个名字会如此重要?潜在的雇主可能只是不青睐外国员工,由此表现出不公平的倾向。然而,不公平也在统计数字上体现出来;由于各种原因,雇主对有特殊背景的人的创造性的期待值,平均来说要比本土人低。举个例子,总体来说他们不可能期待国外出生者对瑞典特定的机构和文化规范有同样的了解,在语言方面有同等的竞争力。

既然录用时决定权在雇主一方,由此瑞典政府出台了多种旨在帮助更多的移民获得工作机会的政策措施。并就此引入了立法,希望让国籍、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上的歧视被视为违法。可是这些法律法规往往难于执行实施。雇主可以辩解说,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实际上一个求职者出生在外国并非权衡录用与否时的决定性因素。也有人建议为移民施行工资成本补贴,办法是降低雇用移民的雇主的社会保险缴款。

解释来到瑞典的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的第三种观点,关注的是决定工资的机制。一致的意见是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这样就降低了对一些人的需求,比如那些不擅长瑞典语的人。人们可能会辩称,假设有大量低收入工作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移民就业挣工资。把这提出来作为政策提案存在一个问题,即工会的目标是减少工资的差别,与之恰恰相反。因此瑞典似乎站在两种选择中间,而两种选择都不能令人满意:是增加移民的就业率、从而接受拉大收入差距,还是接受移民的低就业率、与此同时坚持减少工资不公平现象的目标。

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外出生者及其子女选择零售业、餐馆或开出租车等自营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按时计算的工资较低,但通过工作更长的时间,移民可以合理地提高生活水平。

了解瑞典移民中有很多类人就业都低这一现象,第四个观点聚焦福利国家的举措和公共政策。因此焦点转移到政策制定者及其决策。一个经典的问题是累进所得税制,与之相应的是收入低税也就低,跟不存在这种制度的情形相比,有一份工作并不会带来足够高的回报。这一点重要吗?人们能说的是它如此遏制积极性,会给父母们带来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很多子女的话,因为政策的导向是支持有子女的家庭。想想一个母亲生育四个孩子的情形,如果她要从依赖社会救济为生转向到市场谋工作,计算下她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会有什么变化吧。在新形势下她得不到社会救济金和与收入关联的住房补贴(income-tested housing benefits),还必须缴纳所得税和(如果适用)家庭外抚养儿童的各种费用以及交通成本。因此新形势可能不会使可支配收入发生足够的改观。让工作能增加报酬成为2006年选举后执政的现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所得税制度方面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然而,改革也意味着工作与不工作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人们还会说,其他一些政策或者政策的贯彻落实对移民就业而言不如其他选择那样有积极作用。例如,移民们接触到公共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广泛。让新移民融入瑞典

社会的计划可以更有针对性。还有一项不成功的政策,即把新移民安置在瑞典全境,包括那些劳动力市场不兴旺的地区。而且,给移民教授瑞典语的计划也经常因为不够有效而遭批评。

最后则是准入政策的问题。在基本的层面上,人们可以说很多移民群体与本地人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鸿沟这一局面要归咎于准入政策,因此也就要由政治家们来负责。欧盟和挪威之外的国家的人们哪些可以移民,其指导方针正是政治家们来决定的。不同意现有准入政策的人选出来的政治家可能会选择更严格的政策。从上次议会选举以来,在瑞典议会中有一个党获得了若干席位,它主张大量削减移民准入。该党还主张采取措施鼓励已经接纳的外国公民迁出。在目前形势下,现政府和反对党并没有采纳这类政策方面的改变。

## 六、结 语

本文已展示了几类出生在国外、移民到瑞典的人,他们未能很好地融入瑞典社会,因为他们工作的前景不如本地人广阔。不过,就业问题集中在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身上,他们的外在形象和姓名都与主流有明显的区别。就业问题不止出现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也波及他们的子女。这种状态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互相关联。

我们依据调查研究认为,瑞典移民就业率低的一些原因与移民的特征有关:定居的时间、教育程度、语言技能和健康情况。还有一些可能的理由,关系到找工作时如何连接到网络。作为这些的补充,还有的理由集中在对国外出生的劳动力的需求方面。调查研究显示,雇主方在筛选求职申请时要考虑求职者的名字,移民换一个听起来本地化的名字是划得来的。再有一种类型的理由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因此一些移民没有被吸引去就业。最后,大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可能是不好的政策或者政策执行不到位导致的。其他一般的或针对移民的政策,对一些移民来说会导向更好的就业局势。

我们已讨论了劳动力市场疲势的一些后果。在领取社会救济和伤残抚恤金的人当中,移民占的比例过高。由于平均来说移民不能和当地人同等就业,他们虽然公共转移支付相对较高,但不会缴那么多税。因此大量移民的低就业关系到公共部门预算。劳动力市场疲软也意味着大量移民群体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较低,更可能被视为穷人。然而,我们也看到来自某些西方国家的一些移民和本地人同样有机会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最后,一些类别的移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这导致他们集中在条件差的居住区,出现了居住地隔离的问题,该问题与族群的关系十分紧密,会带来影响持久的负面后果。

参考文献与评注:

There is now a relatively large, and rapidly increasing, literature on immigrant in the Swedish labour market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make justice to all works here.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is provided in:

1. Bengtsson, T., Lundh, C., and Scott, K. (2005) "From Boom to Bus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Postwar Sweden" Chapter 2 in Zimmermann, K. F. (Ed) *European Migration. What Do We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A recent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among natives and immigrants in Europe is:

Dustman, C and Frattini, T. (2011) "Immigr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1,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compares immigrant employment in Europe.

3.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works on the process of hiring immigrants are surveyed by:

Ahmed, A. and Ekberg, J. (2009) "Fältexperiment för att studera etnisk diskriminering på den svenska



arbets – och bostadsmarknaden” , *Socialvetenskaplig Tidskrift* , 16 , ( 2 ) , 105 – 122.

4. On the hiring process see also for example Åslund , O. , Hensvik , L. and Nordström Skans , O. ( 2009) “Seeking Similarity: How Immigrants and Natives Manage at the Labor Market”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 *Discussion Paper* no 4640.

5. That it pays off for immigrant to change to a Swedish sounding name is shown in:

Arrai , M. and Skogman Thoursie , P. ( 2009) “Renouncing Personal Name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urname Change and Earnings” ,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27 , 127 – 147.

6. For a survey of a eleven studies on immigrants use of social assistance see:

Gustafsson , B. ( 2013) “Disparities in Social Assistance Receipt between Immigrants and Natives in Sweden” , to appear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7. Immigrant use of disability pensions is analysed in for example:

Gustafsson , B. and Österberg , T. ( 2006) “Disability Pensions among Immigrants to Sweden” ,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63 , 805 – 816.

8. Studies on how immigrants affect the public sector budget include:

Ekberg , J. ( 1999) “Immigration and the Public Sector: Income Effects for the Native Population in Sweden”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a12 , 411 – 430.

Gustafsson , B and Österberg , T. ( 2001) “Immigrants and the Public Sector Budget – Accounting exercises for Sweden”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14 , 689 – 708.

9.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ttlement policy see:

Edin , P. A. , Fredriksson , P. , Åslund , O. ( 2004) “Settlement Policies and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Immigrants”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17 , 133 – 155.

10. On policies aiming to counterac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ee:

Andersson , R. , Bråmås , A. , and Holmqvist , E. ( 2010) “Counteracting Segregation: Swedish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 *Housing Studies* , 25 , 237 – 256.

**Abstract** After having described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Sweden by country of origin employment among foreign born and their children is surveyed. Employment rates among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s are lower than among native born. Particularly low are employment rates among persons born in low 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 persons who often are easy to distinguish from natives by physical appearance , name and language skills. Reasons for such a state are most likely several and interrelated. We discuss explanations that focu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migrant , the process of hiring work applicants , the relatively high minimum wages in the Swedish labour market as well as decisions taken by politician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Consequences of the weak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are several. They include a larger use of social assistance and invalidity pension than among natives as well as pressure on the public sector budgets. Gaps in disposable income towards natives for many immigrant groups are reported. The weak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immigrants has also made many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live in less 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aggravating problem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which can have far reaching social consequences.

( 廖 暘 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北京 , 100081 )

( 责任编辑 : 黄凌翹 )